

从贸易战 1.0 到 2.0：全球经济博弈的新阶段

鞠建东 侯江槐

摘要：本文在回顾最新文献与相关数据的基础上，系统评估了贸易战 1.0（2018—2024 年）对全球经济格局的深远影响，并深入剖析了贸易战 2.0 阶段（特朗普政府 2.0 时期）的政策特征、内在逻辑及其潜在冲击。研究发现：贸易战 1.0 期间，美国承担了主要的福利损失，制造业回流效果有限，但部分推动了中美供应链“脱钩”与对华科技遏制；与此同时，全球贸易形成了以中美为中心、多节点网络化的新格局，中国实体经济展现韧性并在新兴科技领域取得进展，但受通胀与汇率影响，其名义 GDP 追赶速度放缓，而美国大规模制造业投资的滞后效应值得关注。展望贸易战 2.0，本文分析了特朗普政府更激进的关税策略及面临的通胀与债务约束，预判全球贸易体系可能滑向非合作均衡，美国战略重心或将调整为聚焦科技领先、制造业回流和对华精准遏制。本文通过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为理解和应对全球经济博弈新阶段的挑战提供了系统性的分析视角与政策建议。

关键词：贸易战；关税；中美经贸关系

[中图分类号] F75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70 (2025) 05-0001-25

DOI:10.13510/j.cnki.jit.2025.05.008

引言

自 2018 年起，由美国单方面发起并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争端已成为重塑全球经济格局的核心变量之一。这场以关税为主要武器，并逐步扩展至投资限制、技术管制、产业政策等多维度的博弈，不仅深刻改变了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互动模式，其涟漪效应更广泛触及全球价值链、技术创新轨迹乃至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深刻理解这场贸易战的复杂影响及其未来演变，对于前瞻性地把握全球经济走向、制定有效的国家发展战略，具有关键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现有文献已从不同角度对贸易战 1.0（大致界定为 2018—2024 年）的影响进行了广泛探讨。早期研究多聚焦于关税的直接经济效应，普遍发现关税成本主要由进口国（美国）承担，导致其国内福利损失（Amiti et al., 2019^[1]；Fajgelbaum et al., 2020^[2]；Cavallo et al., 2021^[3]）。随着贸易战的持续，研究视角进一步拓展至供应链重构（Alfaro and Chor, 2023^[4]；Freund et al., 2024^[5]；丁浩员等, 2024^[6]）、

[收稿日期] 2025-03-26

[作者信息] 鞠建东：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侯江槐（通讯作者）：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电子信箱 houjh.21@pbcfsf.tsinghua.edu.cn

制造业回流的实际效果（Flaaen and Pierce, 2019^[7]；Autor et al., 2024^[8]）、对特定产业（如半导体、高科技）的冲击（Bown, 2020^[9]；Han et al., 2024^[10]）以及其政治经济后果（Autor et al., 2020; 2024）等多个层面。这些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证据，但也呈现出一定的碎片化特征，且不同维度影响的综合评估、长期效应的判断以及未来趋势的展望仍显不足。特别是，在经历了拜登政府时期相对“延续与调整”的对华经贸政策后，特朗普政府的回归标志着贸易战进入了一个更具对抗性、政策工具更多元的新阶段（贸易战 2.0），此时对过往经验进行系统性总结，并对贸易战新阶段的特征、逻辑与潜在冲击进行前瞻性、系统性分析，已成为理解未来全球经济博弈新常态的迫切需求。

基于此，本文旨在弥合现有研究在综合性与前瞻性方面的不足，构建一个连接贸易战 1.0 回顾与 2.0 深度展望的分析框架。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第一，系统梳理和整合关于贸易战 1.0 影响的关键事实与代表性文献，覆盖经济总量、制造业与全球供应链、高科技产业等核心维度，力求呈现一幅相对完整的图景；第二，聚焦贸易战 2.0 阶段（特朗普政府 2.0 时期），考察其激进关税策略背后的“负担分摊”（cost-sharing）等政策逻辑，并基于此探讨其对全球经济及贸易体系（包括潜在的非合作均衡趋势与美国战略重心调整）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首先，在文献梳理层面，本文不仅回顾已有发现，更注重整合不同领域的研究成果，并结合最新数据，力图提供一个关于贸易战 1.0 影响的“集成式”解读；其次，在分析框架层面，本文不仅超越了简单的政策列举，更系统性地揭示了贸易战 2.0 的内在政策逻辑、关键约束条件及其可能的演进路径，为深刻理解未来中美经济博弈走向和全球贸易格局演变提供了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基础；最后，在政策价值层面，本文在实证回顾和理论展望的基础上，提炼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启示，以期对相关决策者提供参考。

一、回首贸易战 1.0：2018—2024 年

美国对华经济政策可追溯至特朗普政府启动的 301 调查，随后逐步演化为一个多维度的战略遏制体系。自 2017 年以来，美国在经济层面主要从贸易政策、投资管制与产业政策三个维度展开对华施压。

在贸易政策层面，特朗普政府自 2018 年起对中国实施了多轮大规模关税调整。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的统计数据^①，美国对华商品平均关税税率从 2018 年初的 3.1% 一路攀升至约 20%，并在 2023 年稳定在 19.3% 左右（见图 1）。特朗普政府还促成了 2020 年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署。这一系列举措不仅代表美国贸易政策从多边主义向单边保护主义的明显转向，也在中美双方的经贸往来中埋下了深远的矛盾伏笔。

^①PIIE; US-China Trade War Tariffs: An Up-to-Date Chart [2023-04-06]. <https://www.pii.com/research/piie-charts/2019/us-china-trade-war-tariffs-date-char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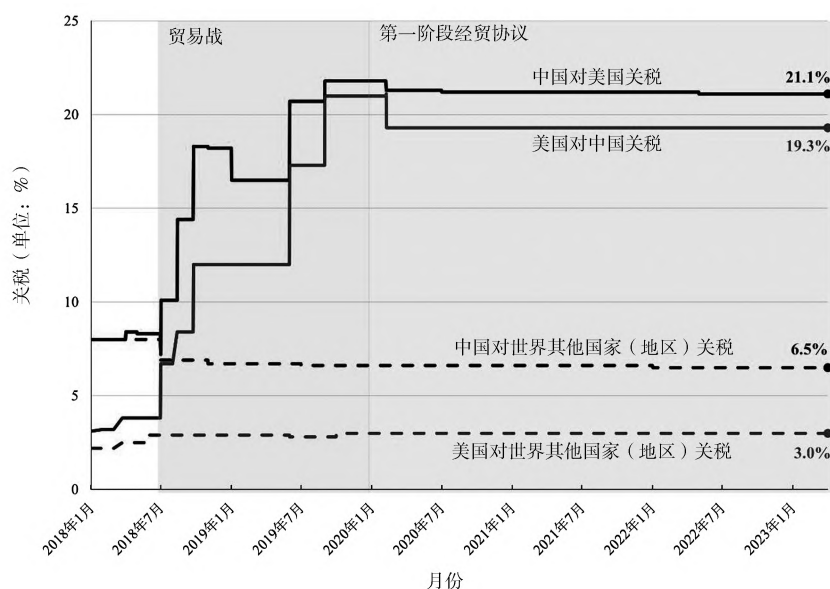


图 1 中美双边及对世界其他国家（地区）关税变动情况

在投资管制层面，美国强化了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职能，并通过《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RMA）对关键技术领域的监管范围进一步扩大。这些举措不仅使中企对美投资面临更严格的限制，也通过限制美国企业或个人投资于中国军工关联企业，形成了双向投资管控的格局。

尽管拜登政府在外交层面更倾向于多边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但其在实质政策上依然延续了保护主义的取向，如继续保留对华高关税，未重启多边贸易谈判，对WTO改革持消极态度等。

在产业政策层面，如表1所示，拜登政府通过多项立法搭建了全面的产业支持体系，包括聚焦传统基建升级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IIJA/BIL）、面向半导体行业的《芯片和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以及旨在推动清洁能源转型的《通胀削减法案》（IRA）。这些法案在投入规模和覆盖领域方面均堪称里程碑，不仅展现了美国重构产业链的战略意图，也标志着美国产业政策正从以市场为主导逐步转向更为主动的政府干预模式。

纵观这些遏制举措，美国对华政策组合呈现出多层次的战略目标：在经济层面，意在保护本国贸易利益、推动制造业回流与就业增长；在产业层面，侧重推进供应链重构并巩固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而在地缘政治层面，则希望维系其军事、金融霸权及对国际秩序的主导权。

为了更系统地把握这些政策的影响，本文将从经济总量、制造业与全球供应链、高科技产业等维度逐一展开分析。具体而言，首先评估美国贸易政策对其国内福利（涵盖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的影响；其次考察制造业回流计划的实际效果；然后探讨全球供应链重构的进展与制约；最后评估这一系列政策对中美两国

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影响。通过多角度的研究，本文力图揭示美国对华经济遏制政策的真正效力与局限性。

表 1 拜登政府主要产业法案概况

中文名称	英文简称	英文全称	通过时间	主要特点
《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	IIJA/BIL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Jobs Act (Bipartisan Infrastructure Law)	2021 年 11 月 15 日	投资总额：1.2 万亿美元 • 新增投资：5500 亿美元 公路桥梁：1100 亿美元 公共交通：390 亿美元 铁路：660 亿美元 电网：650 亿美元 宽带：650 亿美元 清洁饮用水：550 亿美元 • 常规支出续期：6500 亿美元
《芯片和科学法案》	CHIPS and Science Act	Creating Helpful Incentives to Produce Semiconductors and Science Act	2022 年 8 月 9 日	投资总额：2800 亿美元 • 半导体制造补贴：520 亿美元 直接制造补贴：390 亿美元 研发培训：130 亿美元 • 科学研究：1700 亿美元 • 区域技术创新：100 亿美元 • 其他科技投资：450 亿美元
《通胀削减法案》	IRA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2022 年 8 月 16 日	投资总额：7370 亿美元 • 清洁能源和气候：3690 亿美元 • 医疗保健支出：640 亿美元 • 税收执法和赤字削减：3040 亿美元

（一）经济总量：福利损失与 GDP 追赶

多项研究聚焦于贸易战对福利的影响，结论一致：贸易战给美国带来了总体福利损失，价格上涨主要由消费者承担。Amiti 等（2019）、Fajgelbaum 等（2020）、Cavallo 等（2021）、Flaaen 等（2020）^[12] 的研究发现：（1）关税对进口价格上涨的传导几乎是完全的，美国消费者承担了关税带来的价格上涨的主要负担；（2）贸易战降低了美国和中国的总体实际收入，但相对于 GDP 而言幅度不大。Fajgelbaum 等（2020）的研究还发现，贸易战对美国不同地区和人群的福利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农业地区和共和党选民集中的县受到的负面冲击尤为严重，这与中国等国的反制关税主要针对美国农产品有关。

部分研究则将目光投向福利变动背后的微观机制。以 Jiao 等（2024）^[13] 为例，他们利用中国某地级市出口企业的微观数据，对 2018 年美国加征关税对中国出口商的影响做了深入分析。结果显示：第一，美国关税提升并未显著影响中国出口商品的离岸价格（FOB），关税成本基本由美国消费者承担；第二，中国对美出口规模大幅下滑，但对欧盟出口则出现了温和增长，对其他市场的出口影响并不明显；第三，销售渠道与网络的不足是企业跨市场转移的重要障碍。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贸易战背后的政治逻辑及其影响。Autor 等（2020；2024）的研究深入探讨了贸易冲击对美国政治格局的影响。他们发现，受贸易冲击影响的地区，政治观点更趋两极化，对共和党的支持增加。特别是 Autor 等（2024）的最新研究指出，贸易战 1.0 的关税措施虽然未能显著促进美国制造业的就业回流，但却在政治上达到了特朗普政府的预期目标：关税增加了美国民众对共和党的支持，并提高了特朗普在 2020 年总统选举中获胜的概率。这一发现对于理解特朗普政府为何会持续推行贸易保护政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即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被政治上的收益所抵消或掩盖。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诸多福利研究显示美国在贸易战中受到损失，但若从名义 GDP 的角度来看，中国相对美国的比重却在 2021 年达到高点后，于 2023 年出现了明显回落（见图 2）。与此同时，关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总量的具体影响，部分学者也进行了深入研究。樊海潮等（2020）^[14] 利用量化模型分析发现，中美贸易摩擦导致两国的福利水平均有所下降，但整体损失小于 1%。Chor 和 Li（2024）^[15] 利用高频夜间灯光数据和网格层面的关税暴露度量发现，美国加征的关税对中国经济活动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在关税暴露度较高的地区，其 GDP 和制造业就业受到的冲击更大。他们估计，关税暴露度最高的 2.5% 人口所在地区，人均 GDP 相对下降了 2.52%，制造业就业相对下降了 1.62%。这些研究为理解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实际影响提供了重要的量化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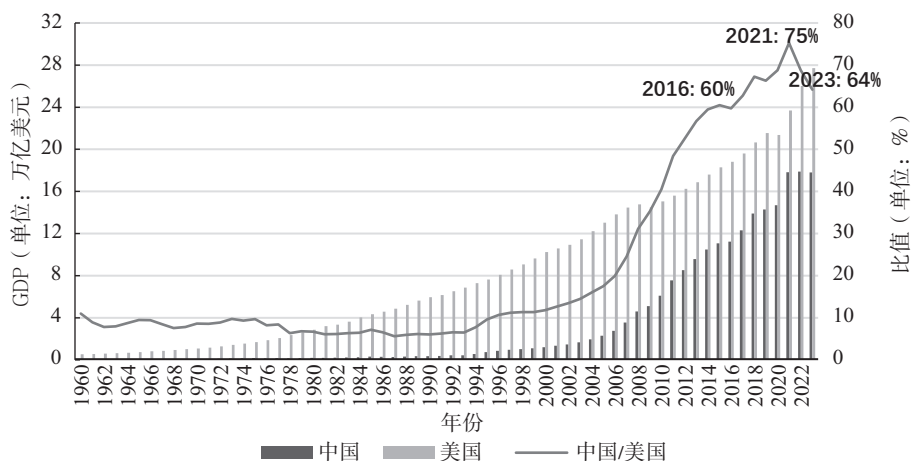


图 2 中美 GDP 及比值

数据来源：World Bank WDI Database。

从具体数据看，2021—2023 年，中国 GDP（以美元现价计）占美国 GDP 的比重从 75.25% 下降到 64.19%，总降幅为 11.06 个百分点。图 3 中进一步分解可以发现：（1）实际 GDP 增速差异。在此期间，中国实际 GDP 增速高于美国，若仅考虑增速因素，中国占比本应上升约 2.07 个百分点。（2）通胀差异。美国通胀率远高于中国，在计算名义 GDP 时，这使美国 GDP 膨胀更快，相当于令中国占比下降约

6.79 个百分点。(3) 汇率变动。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约 8.964%，在已有增长和通胀基础上进一步压缩了以美元计的中国 GDP，使占比继续下降约 6.34 个百分点^①。

由此可见，尽管中国在实际增长方面具备一定优势，但通胀与汇率因素合力抵消了这一正面作用，导致中国名义 GDP 占美国的相对比重显著下滑。而在此过程中，美国在高通胀环境下持续加息，仍保持了美元的强势地位，令其名义 GDP 与中国拉开更大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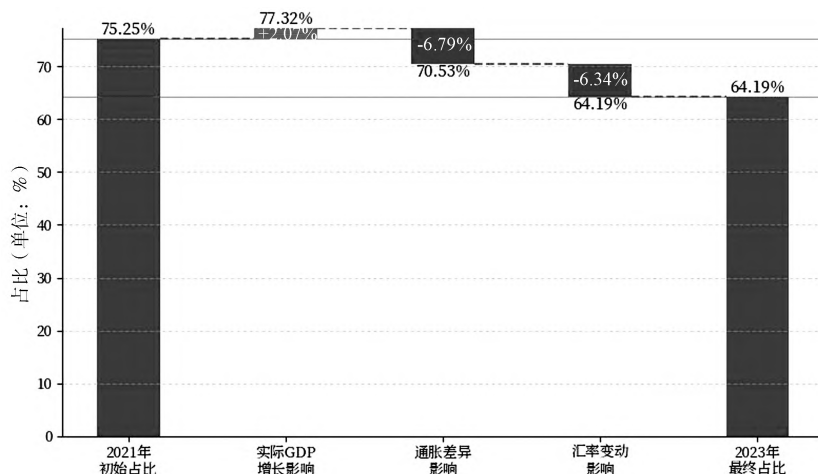


图3 中国 GDP 占美国比重变化的因素分解

数据来源：World Bank WDI Database。

若想剔除汇率因素的干扰，可从购买力平价（PPP）视角进行对比。图4显示，中国基于PPP的GDP在2016年就已超过美国，至2023年约为美国的125%。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2023年中国的PPP转换因子约为1美元=3.64人民币，远低于同期市场汇率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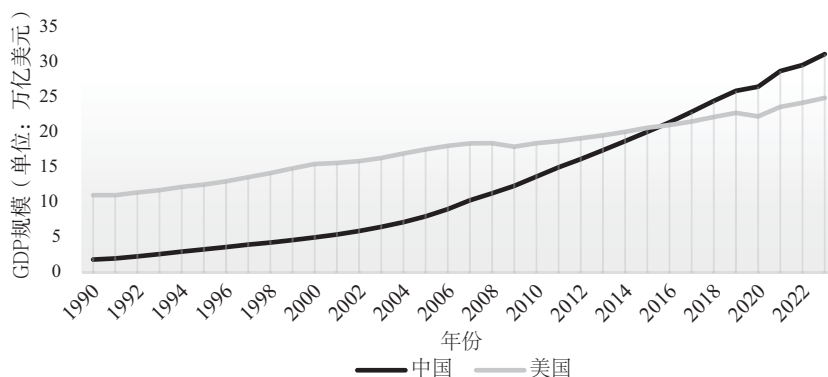


图4 中美基于PPP的GDP规模（使用2021年不变价格）

数据来源：World Bank WDI Database。

^①限于篇幅，具体测算可登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网站“刊文补充数据查询”栏目查阅、下载。

正如前文所述,中国近年来在实体经济方面取得了亮眼的成绩,但金融领域实力不足,导致以美元计价时的名义GDP被低估。在贸易战的背景下,汇率的下降一方面降低了中国的名义GDP,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中国保持出口竞争力。就贸易战导致的汇率下降,美国一度指责中国进行汇率操纵,中方则认为是市场因素导致。

这种金融实力与实体经济实力的背离,部分原因也在于中国长期对资本账户实行较为严格的管制。Ju等(2019)^[16]指出,资本流动管制在一定程度上会压低名义汇率,且对外开放程度不足时,人民币很难充分反映中国经济体量与增长潜力。在此情形下,人民币的相对低估也就成为一种常态。

综上所述,在贸易战1.0期间,从福利角度看,美国是关税成本主要的承担者。然而,在名义GDP层面,由于通胀和汇率的复杂互动,中国对美国的追赶出现了阶段性放缓。同时,贸易战的政治效应不容忽视,其对美国国内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经济虽受到一定冲击,但整体韧性仍在,只是其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名义占比受到金融因素的扰动。

(二) 制造业与供应链:回流困境与格局重塑

1. 美国制造业回流

贸易战对制造业的冲击一直是学术界和政策圈热议的焦点,也曾是特朗普政府1.0时期关税政策的重要宣传口号。Autor等(2013)^[17]的“China Shock”研究开创性地探讨了对华贸易开放对美国工人就业的深远影响,之后也被频频用于佐证美国的贸易保护措施。然而,更多后续研究表明,美国在发起贸易战后,制造业就业并未实现理想中的有效回流与增长。

Flaaen和Pierce(2019)以及Autor等(2024)的研究显示,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后,尽管部分行业获得短期关税保护,但总体上关税对美国制造业就业的负面冲击仍然超过了其正面作用。此外,中国的反制关税对美国农业地区亦造成了明显冲击。Hanson(2020)^[18]、Handley等(2020)^[19]等也得出类似结论:加征关税未能带来美国政府所期待的制造业回流,反而加剧了国内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摩擦。

更具体的量化研究来自Caliendo和Parro(2020)^[20],他们发现从长期看,2018年关税提高虽使美国制造业企业数量增长1.81%,就业人数微增0.06%,但社会福利却下降0.18%,价格指数上升1.18%。在地理分布上,佛罗里达和德克萨斯等州相对更能吸引企业与创造就业,然而传统的制造业腹地——“铁锈地带”获益有限。Strain(2024)^[21]和Lawrence(2024)^[22]也发现,尽管政府出台了高额投资激励,但其分布呈显著不均衡特征,制造业资金主要集中于美国西部与南部地区。

Crane等(2024)^[23]的报告则对美国政府的相关政策效果持更为谨慎的观点。报告指出,尽管美国在半导体与清洁能源等领域有所突破,但制造业整体的复苏仍面临劳动力短缺、成本上升等多重难题。该报告援引美国劳工统计局的预测称,到2032年制造业就业或将再减少11.35万个岗位,这意味着政策带来的新增岗位可能被其他领域的萎缩所抵消。

由图 5—7 可知，纵观长期趋势，美国制造业产值与出口在全球中的占比，以及制造业就业占国内就业的比重，都呈下行态势。虽然 2021 年后美国制造业的产值与出口有小幅反弹，但就业占比并无同步攀升；与之相似，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份额近年来也趋于稳定，这或许主要受美元升值等外部因素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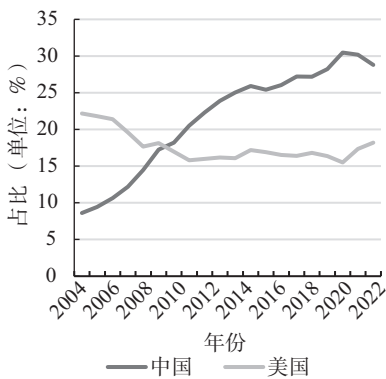


图 5 中美制造业产值全球占比

数据来源：World Bank WDI Databa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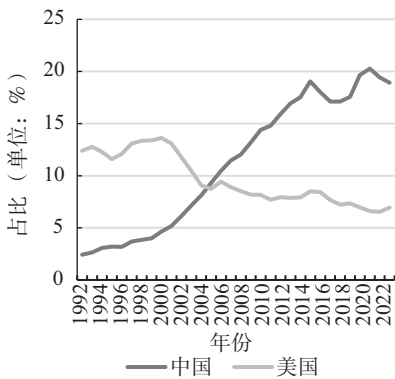


图 6 中美制造业出口全球占比

数据来源：World Bank WDI Databa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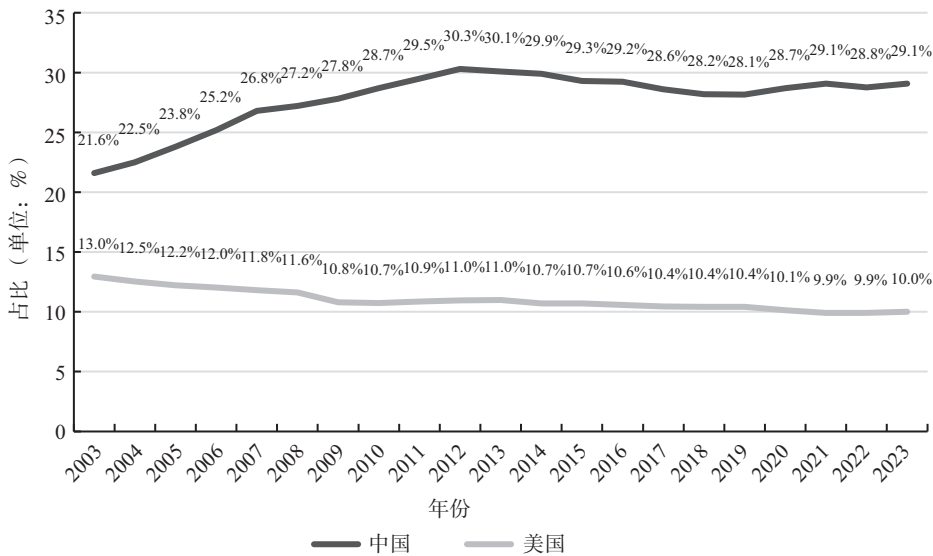


图 7 中美制造业就业国内占比

数据来源：UN SDG Database，中国国家统计局。

图 8 的美国国内数据显示：（1）在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内（2017—2020 年），美国的制造业投资、产出、就业均无明显变化；（2）在拜登政府的产业政策推动下，美国制造业部门的投资规模大幅上涨，但相应的产出和就业增长仍不明显。

图 9 中进一步拆分数据可以发现，2021 年下半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建筑建设投资出现了显著增长，而这一趋势在各细分行业中并不均衡。其中，计算机、电子

及电气行业占据主导地位，其建筑建设支出远高于其他行业。具体而言，2021—2024 年，该行业的私人部门建筑建设投资年均值约为 700 亿美元，相比 2018—2020 年平均约 80 亿美元的水平，每年多出了 620 亿美元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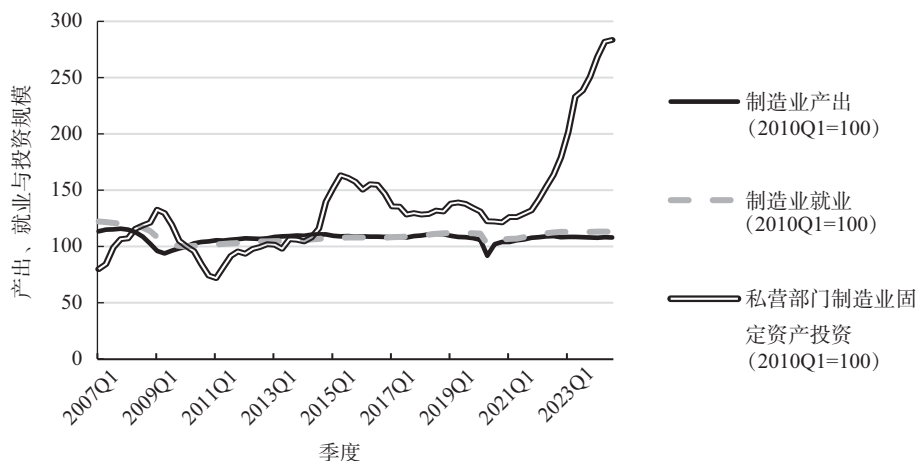


图 8 美国制造业产出、就业与投资情况 (2007Q1—2024Q3)

数据来源：US Census Bureau,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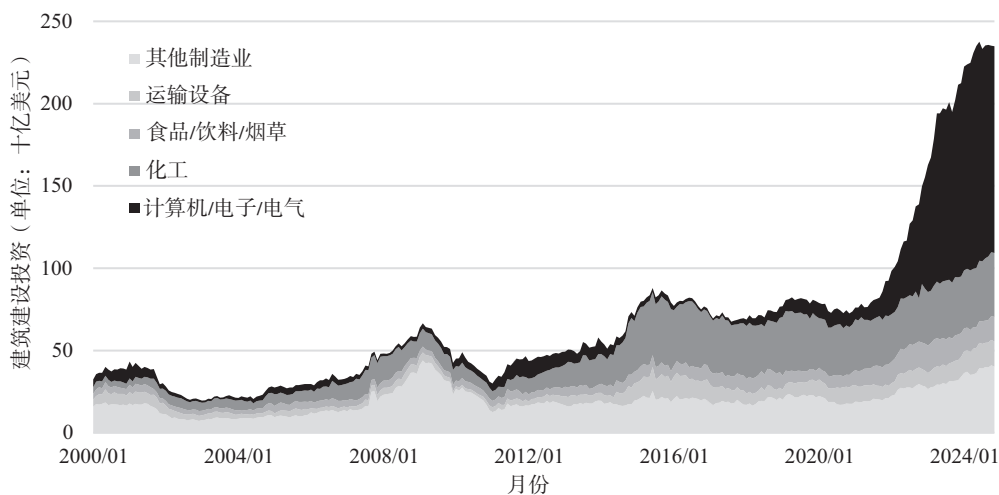


图 9 美国私人部门制造业细分行业建筑建设投资 (2000.01—2024.11)

注：数据为经季节调整的年化数据；建筑建设投资主要为建筑物的相关建设支出，不包含生产设备的采购等。

数据来源：US Census Bureau。

这波高额投资与美国政府推出的《芯片和科学法案》密切相关，也与半导体产业“回流”或“本地化”诉求相呼应。英特尔、台积电、三星等巨头纷纷加大在美投资：英特尔斥资逾 200 亿美元在亚利桑那州钱德勒建设新一代芯片制造基地，预计可创造 3000 个就业岗位；台积电则宣布在美总投资规模将突破 650 亿美元，创下美国历史上最大绿地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纪录。

虽然美国当前的制造业 GDP 尚未出现显著同步增长，但这轮大规模投资无疑预示着潜在的产能扩张，其最终成效仍有待时间检验。大型制造业项目往往需要数年建设周期，如一座先进的半导体工厂从破土动工到量产可能需时 2~3 年甚至更久。因此，近来观察到的巨额投资对制造业 GDP 的影响预计会在未来几年逐渐体现。

经济学界也普遍认可制造业投资的滞后效应。例如，De Long 等（1992）^[24] 强调设备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长期拉动，认为其核心价值在于“干中学”带来的生产率提升。Podrecca 和 Carmeci（2001）^[25] 则运用面板数据方法，说明投资与经济增长间存在动态的互为因果关系。综合来看，制造业投资对产出的最终影响取决于建设周期、技术进步、市场需求等多重因素，短期见效和长期累积效应往往交织在一起。基于此，当前飙升的投资数字很可能在今后数年为美国制造业 GDP 提供额外支撑，其潜在长期影响值得持续关注。

然而，这些投入巨资兴建的工厂在投产后能否保持足够的竞争力，并转化为可观的制造业增量产出，仍面临多重不确定性。能源、劳动力、原材料以及物流等各项成本的可控程度，将直接影响其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地位。与此同时，能否融入并构建具备韧性的全球或区域供应链，以及目标产品的市场需求能否保持稳健增长，都是左右项目成功的关键要素。

尽管《芯片和科学法案》等政策工具可在早期提供一定扶持，其可持续性和效果仍存在很大变数。基于这些挑战，目前尚难对这些新建产能的未来竞争力作出明确评估。不过，大规模投资本身昭示了美国欲重塑国内制造业格局的决心，其潜在长期效应无疑值得关注。

2. 供应链重构

供应链重构同样是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关键目标之一，旨在削弱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根据 Lovely（2023）^[26] 的总结，美国主要采取了“回流”（reshoring）、“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和“去风险化”（de-risking）三项策略。其中，“回流”战略主要依托《芯片和科学法案》对半导体产业和《通胀削减法案》对清洁能源产业的支持；但如前文所述，这些举措暂未带来实质性影响。“友岸外包”与“去风险化”则分别通过间接方式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至美国盟友，以及直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Grossman 等（2024）^[27] 建立了一个包含搜索成本、配对生产率与价格谈判机制的供应链模型，阐明了关税在供应链中的微观作用：小规模关税主要通过价格谈判影响供应链结构，而大规模关税则可能导致供应链重组。该理论框架突出了传统关税分析中常被忽视的供应链特有机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丁浩员等（2024）基于 FactSet Revere 全球供应链数据的实证研究验证了这一模型的核心预测：贸易政策冲击会显著提高供应链“断链”风险，但在产品替代困难、契约成本较高或合作历史悠久的场景下，供应链韧性更强。此外，他们还发现中美企业间一旦“断链”，仅有 0.52% 的案例会直接恢复原有合作关系，大部分企业更倾向将供应链转移至近岸、本土或欧美等其他地区。

那么,美国的供应链重构是否实现了预期目标?文献普遍认为,美国确实有部分行业减少了直接从中国的进口规模,但同时拉长了全球供应链的链条,对中国的整体依赖并未显著降低。Bown (2022)^[28] 通过对贸易战四年来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美中经济“脱钩”程度因产品类别而异:受 25% 高关税影响的商品(如半导体、IT 硬件)从中国的进口下降了 22%,而未受关税影响产品(如笔记本电脑、手机、游戏机)的进口反而增长了 50%,这导致中国在美国进口市场的整体份额从贸易战前的 22% 下降到 18%,但在特定领域如笔记本电脑和显示器仍保持 92% 的市场份额。Lovely (2023) 也指出,虽然美国从中国进口的电子产品份额下降,越南的份额几乎同步上升,但越南所需的半导体、电话零件等电子元件中有超过一半来自中国,这反而令供应链更为冗长且不透明。Baldwin 等 (2023)^[29] 指出,美国对外国供应商的依赖远高于传统贸易数据所显示,若追溯至价值链上游,美国对中国的依赖依然显著。Freund 等 (2024) 则发现,中国对美出口份额虽下降,但与中国供应链深度融合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填补了这部分空缺,这些国家为满足对美出口需求,反而加深了对中国的价值链依赖。Alfaro 和 Chor (2023) 也发现,尽管 2018—2023 年间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下降约 18%,但对越南和墨西哥的进口分别增长 83% 和 31%,而越南和墨西哥对中国中间品的依赖度则分别提升 76% 和 45%,意味着供应链仍在间接依赖中国,并面临成本上升与通胀风险。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沈国兵和王译平 (2024)^[30] 指出,拜登政府的供应链重塑战略促使中国关键行业产品向第三方国家转移,同时加深了与这些新贸易伙伴的联系。2023 年,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增长了 15.3%,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则增长 12.8%。Fajgelbaum 等 (2024)^[31] 和 Waugh (2019)^[32] 的研究也发现,高关税和进口限制致使中美两国间的贸易额双双萎缩,却同时带动了其他国家中美两国的出口。部分国家不仅重新分配了对中美的出口商品,还扩大了在其他市场的出口份额,说明第三方国家在贸易战中获得了新的机遇。因此,美国政策并非只带来替代效应,更推动了全球贸易格局的整体重塑。

国内研究也关注了贸易战对中国产业链和企业行为的影响。例如,谭莹等 (2022)^[33] 利用上市公司数据发现,尽管最终品关税加征有利于保护国内就业,但中间品关税的增加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大,显著抑制了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尤其对市场势力较小的非国有企业影响更甚。余森杰等 (2022)^[34] 利用海关数据发现,中国对美加征的反制关税显著抑制了从美国进口中间品,并且由于进口中间品与出口之间存在正向联系,反制关税也间接抑制了中国企业对美国的出口。田巍等 (2023)^[35] 利用零售价格数据发现,中国对美反制关税对国内零售价格影响有限,但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则通过降低市场竞争程度、提高企业加成等方式显著抬高了国内零售价格,损害了消费者福利。樊海潮等 (2024)^[36] 的研究则关注了国内要素流动在应对外部冲击中的作用,发现若不考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和行业投入产出联系,会显著低估贸易战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并且劳动力净流出越大、对美贸易依存度越高的地区受到的冲击更大。这些研究从不同维度揭示了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复杂影响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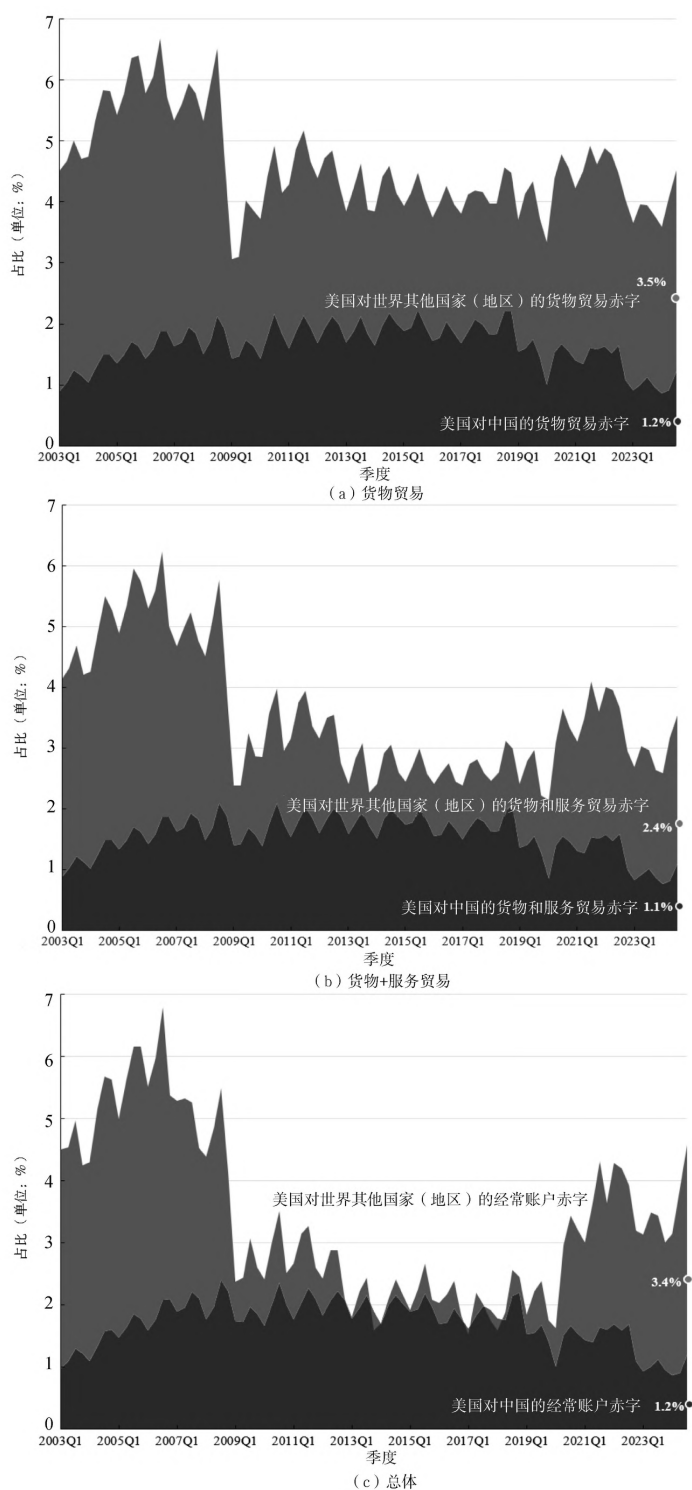


图 10 美国对外经常账户赤字占 GDP 比重（2003Q1—2024Q3）

数据来源：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Xue (2024)^[37] 进一步关注了供应链重构引发的 FDI 转移对福利的影响。他的多国一般均衡模型结果表明, 贸易战导致的 FDI 转移会显著放大中国的福利损失, 损失规模可达原先预期的三倍, 主要通过工资水平下降和消费价格上升两个渠道实现。这一发现与 Fajgelbaum 等 (2020) 等早期研究形成了鲜明对比, 也凸显了将 FDI 转移因素纳入分析的重要性。

图 10 中的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数据同样印证了这一供应链调整: 2018 年后, 美国对全球范围的贸易赤字总额占 GDP 比重 (无论是货物贸易、货物+服务贸易还是整体经常账户口径) 基本保持稳定, 甚至在 2024 年第三季度于总体口径下达到了金融危机以来的新高。然而, 其对华贸易赤字占 GDP 比重自 2022 年第四季度以来明显下降。这说明美国整体的贸易逆差仍在, 但来源更为多元, 对华逆差不再“一家独大”, 反映了贸易结构和供应链格局已出现明显变化。

从进出口数据来看, 中美之间的贸易联系虽有一定程度的削弱, 但中国与全球其他经济体的贸易联系正在进一步增强: 截至 2023 年, 中国虽不再是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被墨西哥取代), 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贸易影响力仍在提升。WTO 数据显示, 2023 年中国商品贸易占全球商品贸易总额的 14.8%, 较 2017 年提升了 1.2 个百分点。

综上所述, 贸易战 1.0 并未实现美国制造业的显著回流和就业增长, 但拜登政府的产业政策已引致大规模制造业投资, 其长期效果待考。供应链层面, “去中国化” 取得部分进展, 表现为美国直接从中国进口减少, 但全球供应链变得更为迂回, 对中国的间接依赖通过第三方国家得以维系, 甚至强化。同时, 中国也借此机会拓展了与其他经济体的贸易联系, 全球贸易格局呈现出以中美为双中心、多节点网络化的新特征。

(三) 高科技: 遏制压力与自主突围

在高科技领域, 美国通过强化 CFIUS 审查、收紧技术出口管制等多重手段, 对中国高科技产业施加遏制压力。Crane 等 (2024) 指出, 美国在先进芯片等关键技术上联合盟友构筑起多边出口管制体系, 使中国企业获得 EDA 软件或尖端芯片制造设备的难度显著上升。荷兰 ASML 及日本东京电子等核心设备供应商纷纷停止向中国出口最新制程的设备, 这进一步收窄了中国对外获取关键技术的渠道。

然而, 也有众多文献指出, 美国的限制政策在短期虽能造成冲击, 却同时激励了中国企业的自主研发。Bown (2020) 对华为案例的研究发现, 被列入实体清单后, 华为大幅增加了研发投入, 并在操作系统等关键领域取得进展。Ju 等 (2024)^[38] 的研究探讨了贸易战和产业政策竞争的互动, 认为美国的遏制措施可能促使中国加大对战略性产业的扶持力度。一些评论和报告也指出, 美国的“技术脱钩”策略可能加速中国在半导体设计、EDA 软件、基础材料等“卡脖子”环节的研发突破, 长期效果可能与美国的初衷相悖。相关实证研究也揭示了这种复杂性: Han 等 (2024) 通过专利引用分析发现, 中国对美技术依赖度在 2009 年后呈下降趋势; 同时, 美国制裁虽损害了受冲击企业 (及其下游) 的生产率与盈利能力, 却也提升了其创新的原创性, 并显著促进了上游供应商的生产率与创新表现。另一

项来自 Cao 等 (2024)^[39] 的研究则侧重于创新产出本身,发现实体清单制裁降低了目标企业的专利数量与质量,特别是通过减少与美国发明人的合作实现,但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受影响较小。该研究同样观察到,制裁刺激了上游领域的专利活动增加,印证了对国产替代的推动作用。

图 11 显示,就高科技产业整体而言,近年来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总额呈稳步攀升态势,尽管自 2022 年后有所放缓,但在 2023 年的出口规模仍远高于美国(后者仅相当于中国的约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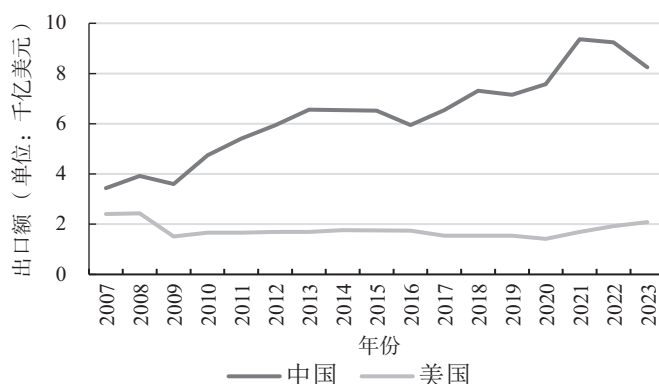


图 11 中美高科技产品出口额

注:高科技产品包括航空航天、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电子及通信设备、制药、科学仪器、电气机械、化学产品、非电气机械和军工装备。

数据来源: World Bank WDI Database。

在 21 世纪 20 年代,新能源与人工智能 (AI) 是全球最受关注的高科技领域。新能源方面,中国已在电动车、光伏、风能等方向展现明显优势,产品出口总额大幅领先美国。从特朗普新政府宣布撤销拜登时期《通胀削减法案》中的新能源补贴,并转向传统能源政策来看,美国几乎放弃了在此领域与中国正面竞争。

AI 领域则更具复杂性,涵盖软硬件的多重维度。美国虽通过出口管制限制高性能 AI 芯片出货,但意外地推动了中国本土 AI 芯片加速发展。在软件与算法层面,美国在大型语言模型等前沿技术上凭借先发优势占据领先地位;而中国借助庞大市场与丰富应用场景,在 AI 商业化上同样展示出强劲潜力,出现了如 DeepSeek 等兼具质量与性价比的创新企业。考虑到中国市场规模与应用领域的多元性,未来中国在 AI 落地应用方面不乏赶超美国的可能。

综上所述,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对华遏制政策,在短期内确实给中国获取部分尖端技术带来了困难,尤其是在先进半导体制造设备等方面。然而,这些限制也显著刺激了中国的自主研发投入和在关键技术领域的突破意愿。中国在高科技产品出口(尤其是新能源领域)上仍保持强劲势头,并在 AI 等前沿领域展现出追赶潜力。外部封锁可能在长期内加速中国的技术自主化进程,并重塑全球科技创新格局。

二、贸易战 2.0 的演进与展望

自 2025 年初特朗普政府重掌白宫以来，全球贸易格局经历了剧烈的动荡。与 2018—2024 年的贸易战 1.0 相比，新一轮的贸易冲突（贸易战 2.0）呈现出更为激进、系统化的特征。本部分旨在梳理 2025 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的演进脉络，剖析其背后的政策目标、理论基础与现实约束，并在此基础上展望未来贸易战的可能走向及其对全球经济秩序的深远影响。

（一）2025 年特朗普关税政策的升级与全球应对

贸易战 2.0 的烽火经历了一系列前期的政策铺垫和逐步升级，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 阶段一：早期铺垫与升级（2025 年 1—3 月）

（1）针对中国的初步施压。早在 2025 年 2 月 1 日，特朗普政府便以应对芬太尼危机等国家安全问题为由，宣布对所有源自中国（包括香港地区）的进口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并于 3 月 4 日将此税率翻倍至 20%。这一行动不仅重启了对华关税战，也明确将贸易工具与国家安全议题直接挂钩。

（2）施压北美邻国。同样在 2 月 1 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几乎所有进口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对加拿大能源和钾肥设定了较低的 10% 税率），理由是两国未能有效遏制非法移民和毒品（特别是芬太尼）的跨境流动。尽管在两国承诺加强边境管控后，美方同意将关税实施推迟 30 天至 3 月 4 日，并随后对符合《美墨加协定》（USMCA）原产地规则的商品给予了暂停豁免（最初为一个月，后延长），但这一举措已然打破了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基本框架，向盟友传递了强烈的保护主义和交易主义信号。

（3）全球性行业关税。特朗普政府还重启并扩大了基于国家安全的行业性关税。2025 年 2 月，美国政府宣布将自 3 月 12 日起，取消此前对部分盟友的豁免，并将全球范围内进口钢材和铝材的关税统一提升至 25%（铝材从之前的 10% 上调）。紧接着，3 月 26 日，美国政府宣布自 4 月 3 日起对几乎所有进口汽车（包括轿车、SUV、卡车等）征收 25% 的关税，并计划于 5 月 3 日起对发动机、变速箱等核心汽车零部件也加征同样关税。这些措施不仅直接打击了欧盟、日本、韩国等主要汽车和钢铁生产方，也进一步加剧了全球供应链的紧张局势。

2. 阶段二：“对等关税”的全面爆发（2025 年 4 月）

2025 年 4 月 2 日，特朗普政府发布了标志性的第 14257 号行政令，以应对所谓“庞大且持续的美国商品贸易逆差”所构成的“国家紧急状态”。该行政令推出了“对等关税”计划，其核心内容包括：

（1）普遍基准关税。自 4 月 5 日起，对几乎所有进口商品（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商品除外，维持 2 月关税安排）加征 10% 的“基准”关税。

（2）特定国家（地区）附加关税。针对行政令中列出的 57 个国家（地区）（包括欧盟、日本、韩国、印度、越南、瑞士、中国台湾地区等主要贸易伙伴），

在 10% 基准关税之外，自 4 月 9 日起再加征 11%~50% 不等的“对等关税”。白宫声称这些税率是基于对各贸易伙伴“非互惠或歧视性贸易行为”（主要用双边贸易逆差额来衡量）的评估。

（3）对华关税急剧升级。针对中国（含港澳地区），原定 34% 的“对等关税”（叠加 20% 芬太尼相关关税，总计 54%）在 4 月 9 日因中国宣布反制而迅速提升至 84%，随后在 4 月 10 日进一步飙升至 125%。叠加此前的 20% 关税，使得许多中国输美商品的有效关税税率达到了惊人的 145%。

（4）取消低价值商品免税。针对中国的低价值（800 美元以下）进口商品，特朗普政府取消了其免税待遇，并自 5 月 2 日起对其征收高额关税（最初宣布 30%，后提升至 90%，4 月 9 日最终定为 120%）或按件征收高额费用（5 月 2 日为 75~100 美元/件，6 月 1 日提升至 150~200 美元/件）。

3. 阶段三：设立 90 天谈判窗口与暂时缓和（2025 年 4 月）

面对全球市场的剧烈动荡和多国强烈的反制信号，特朗普政府在实施全面“对等关税”后迅速进行了一系列调整，试图为谈判创造空间并管理部分冲击：

（1）设立 90 天谈判窗口并暂停部分附加关税。2025 年 4 月 9 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对除中国（含港澳地区）外的、被列入第 14257 号行政令附件一的所有国家（地区），暂停征收超出 10% 基准关税的特定国家附加关税，为期 90 天。在此期间，这些受影响的贸易伙伴仅需承担 10% 的普遍基准关税。白宫给出的理由是，已有超过 75 个国家表达了谈判意愿，且未采取“有意义的”报复措施。此举被视为旨在分化各国反应、孤立中国，并为后续双边谈判铺路。特朗普本人亦公开表示不排除延长暂停期的可能性。

（2）豁免部分关键电子产品的高额对华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BP）于 2025 年 4 月 12 日宣布，针对源自中国的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以及包括半导体和平板显示器在内的其他若干关键电子产品，将豁免此前宣布的 125% “对等关税”（这些产品仍需承担 20% 的芬太尼相关关税和可能存在的其他早期关税）。这一豁免被解读为一种战术性微调，意在减轻对美国消费者和高科技产业的直接冲击，并承认了这些关键产品供应链高度集中于中国的现实。

（3）日内瓦中美经贸会谈。中美两国于 2025 年 5 月 12 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经贸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自 2025 年 5 月 14 日起，美国对华商品加征的关税税率从此前的 145% 大幅下调，取消 91% 的加征关税税率，90 天内暂停 24% 的加征关税税率，但仍保留 20% 的“芬太尼关税”以及 10% 的基准关税。作为回应，中国亦将对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从 125% 降至 10%，且 90 天内暂停 24% 的加征关税税率。结合前文所述，特朗普 1.0 时期的中美双边平均关税水平均为 20% 左右，而当前美国对华平均关税水平为 50% 左右，中国对美平均关税水平为 30% 左右。

4. 特朗普政府关税措施面临的全球应对与影响

特朗普政府激进的关税政策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强烈反弹和多样化的策略调整。作为主要打击目标，中国迅速采取了对等且逐步升级的报复行动。针对美方自

2025年初启动并不断加码的关税措施，中国不仅针锋相对地对等加征关税，最终将大部分美国输华商品的关税提升至极高水平，还综合运用了非关税壁垒，包括将美企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扩大关键矿产出口管制，暂停部分农产品进口许可及发起反倾销调查等。在外交层面，中国将美方行为斥为“经济霸凌”，展现了不屈服的坚定立场，同时积极寻求与其他受影响国家协调，并加速区域经济合作进程。

欧盟方面，虽然初步批准了报复性关税计划以回应美国的钢铝及后续的普遍关税，但在美方为谈判提供90天暂停窗口后，欧盟也选择暂停实施报复，并派遣高级官员赴美磋商，优先寻求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美国的北美邻国反应各异。加拿大采取了迅速且广泛的报复措施，针对美国的多轮关税，对价值数百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加征了“对等关税”，涉及农产品、工业品及钢铝、汽车等关键领域。相比之下，墨西哥虽同样面临高额关税压力并声称将反制，但其公开宣布的具体报复措施有限，并有迹象显示其试图通过加强边境管控合作等方式寻求关税豁免或推迟，整体姿态更为克制。

其他主要经济体，如日本和韩国，尽管对其汽车、钢铁等支柱产业面临的潜在冲击表达了严重关切，但并未选择立即跟进实施直接的关税报复。这些国家更倾向于采取观望和评估的策略，同时通过双边渠道与美国进行沟通。它们也加强了区域内的经济协调，例如与中国共同参与中日韩经贸部长会议，讨论加速自贸区谈判和维护供应链稳定等议题，但在联合反制美国关税上并未形成具体行动。这反映出它们在维护自身经济利益、深化区域合作与维持传统对美同盟关系之间进行的复杂平衡。

关于特朗普政府的“对等关税”政策的影响，在经济基本面方面，依据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的研究^①，这些关税措施预计将对美国经济造成实质性损害。仅初步宣布的关税就可能导致2025年实际GDP增长率下降0.5个百分点，并使经济规模长期收缩0.4%（年损失约1000亿美元）。若计入后续调整及国际反制，对当年GDP增长的拖累预计达1.1个百分点，长期经济规模萎缩幅度扩大至0.6%（年损失约1700亿美元）。同时，关税显著推高了美国国内物价，修订后的政策预计使短期物价上涨2.9%，导致美国家庭平均购买力损失约4700美元，且长期物价水平预计仍将高出1.7%。研究亦指出，此轮关税具有明显的累退效应，对低收入群体的相对冲击远大于高收入群体，特定商品如服装和汽车价格面临急剧上涨压力。

在金融市场层面，该关税政策的实施与升级，特别是中美贸易紧张关系的激化，在短期内引发了全球市场的剧烈动荡和非典型的避险失灵现象。政策宣布后数日内，市场出现了罕见的美国“股债汇三杀”局面：主要股指大幅下挫超过10%，

^①Budget Lab at Yale: Where We Stand: Fiscal, Economic, and Distributional Effects of All U. S. Tariffs Enacted through 2025 (as of April 2024) [2024-04-18]. <https://budgetlab.yale.edu/research/where-we-stand-fiscal-economic-and-distributional-effects-all-us-tariffs-enacted-2025-through-april>; Budget Lab at Yale: Fiscal and Economic Effects of Revised April 9 Tariffs [2024-04-18]. <https://budgetlab.yale.edu/research/fiscal-and-economic-effects-revised-april-9-tariffs>.

作为传统避险工具的美国国债遭遇抛售、收益率不降反升（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上行逾 40 个基点至接近 4.6%），美元指数亦承压走弱。这种反常的市场联动反映了投资者对于美国单边主义政策、未来通胀、财政状况以及主要债权国可能减持美债等风险的深层忧虑，暗示市场可能正在重新评估美国资产的信用风险。

（二）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目标、思路及面临的约束

要理解并推测贸易战 2.0 的演进，需从特朗普政府的核心目标、主要理论支撑及现实制约三方面着手。

1. 核心目标

特朗普政府在发起并升级贸易战 2.0 时，延续了其“美国优先”理念，集中体现为以下四个核心目标：

（1）制造业回流。根据全球化和“失衡”贸易导致美国制造业流失的判断，政府希望通过高关税等手段抬升进口成本，迫使跨国企业将生产线迁回美国，以提振就业、重建工业基础。

（2）缩减贸易逆差。将双边商品贸易逆差视为美国受损的直接证据，认为“对等关税”可迫使顺差国作出市场开放或汇率调整，从而实现更“公平”的双边贸易。

（3）提高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政府通过多种手段（包括关税施压、推动汇率调整、“财政贬值”效应、国内减税和放松管制等）降低美国企业的生产和运营成本，使其在国内外市场上更具优势，同时利用关税作为谈判筹码，迫使他国开放市场、保护美国知识产权。

（4）让其他国家分担美元作为安全储备货币的成本。认为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导致其币值长期高估，这对美国制造业和出口部门造成了负担，而美国同时承担着提供全球安全保障的成本。政府的目标并非终结美元的储备地位，而是通过关税、与贸易伙伴在安全和贸易上进行捆绑谈判、或潜在的金融政策（如推动多边汇率协议、对外国官方持有的美国国债收取“使用费”）等方式，迫使其他国家（尤其是贸易顺差国和安全盟友）“分摊”维持美元体系和全球安全体系所产生的经济与金融负担。

2. 理论支撑

在理论层面，贸易战 2.0 的操作似乎从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那里找到了“量身定制”的学理支撑。米兰在 2024 年 11 月的《重塑全球贸易体系用户指南》和 2025 年 4 月的演讲^①中，精心构建了一套以“负担分摊”为核心的话语体系，试图为特朗普政府激进且备受争议的关税政策提供理论支撑：

（1）美国“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与“特里芬难题”。米兰认为，美国承担了

^①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CEA Chairman Steve Miran at Hudson Institute Event [2025-04-18].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2025/04/cea-chairman-steve-miran-hudson-institute-event-remarks/>.

军事“安全伞”和美元“金融伞”两大“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成本，却因“特里芬难题”被迫长期输出美元并承受贸易逆差压力，损害其制造业竞争力。米兰选择性地强调美国承担的成本，却刻意淡化美国从中获得的巨大战略与经济利益（如美元霸权红利），将贸易逆差完全归咎于“特里芬难题”的外部性，是对国内结构性问题的有意回避。

（2）关税作为“负担分摊”手段。面对他所认定的全球“搭便车”行为，米兰主张对美顺差国征收关税以“收费”，此举可补贴美国财政并减少公共产品供给成本；他更强调关税并不必然导致美国内部通胀，而可能由出口国经由汇率或利润率调整来承担。米兰在关税“分摊”上表现出了强烈的“一厢情愿”，其断言成本主要由出口国承担而非转嫁给美国消费者，这种观点不仅与大量实证研究相悖，也低估了关税对国内通胀和产业链的破坏性冲击。

（3）“海湖庄园协议”与货币重估。米兰设想以高关税及安全保护为谈判杠杆，促使主要顺差国同意在外汇市场进行协调干预，使美元实现 20% 左右的有序贬值（“海湖庄园协议”）。其目的在于纠正美元高估，支持美国本土制造业复兴。米兰的方案看似巧妙，但却忽视了国际政治经济的阻力。主要顺差国（如中国）未必会配合，且美元贬值可能引发资本外流，动摇其储备货币地位。

（4）美债置换与“金融战”应对。为防范贸易伙伴抛售美债、推高美国融资成本，米兰建议将外国持有的短期美债置换为超长期（如 100 年期）债券，辅之以美联储的流动性支持机制，以维系美债市场稳定、降低“金融战”风险。米兰提出将短期美债强制置换为超长期债券的“奇招”，这不仅挑战了主权债务的基本信用原则，更会向市场传递出美国财政困境和金融不稳定的危险信号，其维稳效果值得高度怀疑。

通过上述理论，米兰实质上构建了一套为单边主义行动辩护的新重商主义话语体系。其将贸易逆差、美元霸权与国家安全紧密联系，并通过“负担分摊”概念为美国的激进关税行动提供了理论正当性，形成了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独特思想基础，但其理论要点暴露出明显的偏颇与风险。

3. 现实制约

与理论相对应的是，特朗普政府的野心勃勃在冰冷的现实面前，正遭遇两大难以逾越的“硬约束”：

（1）通胀压力。美国通胀率虽较 2022—2023 年高峰有所回落，但 2025 年初仍高于美联储 2% 的目标。高关税势必抬升进口成本并经产业链传导至消费端，可能迫使美联储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增加经济下行风险。前文提及的耶鲁大学的研究也显示，关税的累退效应和通胀效应显著，加剧了低收入群体的实际负担。

（2）美债市场脆弱性。在联邦债务已处高位的情况下，主要贸易对手国（如中国、日本等）持有大规模美债。一旦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或外方“武器化”其美债资产，将造成美债收益率飙升并削弱美元信用地位。虽然米兰提出“马拉歌协议”和长期债券置换等方案以预防“金融战”，但市场在 2025 年 4 月初的“股

债汇三杀”已表明，美债和美元的避险地位正经受前所未有的质疑。美国政府在制定关税策略时，不得不顾及触发金融风险的潜在代价。

总体来看，以上目标、理论与约束共同塑造了贸易战 2.0 的政策逻辑：在“美国优先”与所谓“负担分摊”思路的推动下，特朗普政府展现出较为激进的单边关税倾向。但高估单边影响力、忽视经济权衡以及理论逻辑的漏洞，可能使其付出超出预期的代价。而通胀加剧、金融动荡等副作用的掣肘或将成为检验其成败的关键。

（三）展望：趋向非合作均衡与战略重心的调整

贸易战 2.0 的未来走向固有其不确定性，然结合其爆发态势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逻辑，仍可勾勒出若干可能的演进方向。尽管在 2025 年 4 月，面对全球市场的剧烈反应，特朗普政府设立了为期 90 天的谈判窗口，并暂停了对部分国家的附加关税（中国除外），但这更似一种策略性的调整，意图分化对手、管控短期冲击，而非政策方向的根本逆转。长期而言，其单边主义与交易主义倾向，叠加主要经济体的反制与策略适应，可能正将全球贸易治理推离基于规则的多边框架。

一种值得关注的趋势是，世界贸易体系可能趋向于一种“纳什均衡”关税状态。在缺乏有效合作机制约束下，各国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如改善贸易条件、保护国内产业），有动机单方面设定并调整关税，最终可能达到一个非合作的均衡点。在此均衡下，虽无国家能通过单边改变策略获益，但整体关税水平显著高于合作状态，导致全球贸易成本上升、效率降低。贸易战 2.0 中，美国绕开 WTO 大规模加征关税以及各国的反制与策略性观望（如欧盟、加拿大在反制后暂停以待谈判），均可视为这种非合作博弈的表征。若此趋势延续，WTO 所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权威将进一步式微，全球贸易或将进入一个关税水平普遍偏高、波动性增大、且主要由大国力量平衡与策略互动主导的新阶段。

在此背景下，展望未来，特朗普政府贸易与关税政策的战略重心或将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调整与强化：

（1）巩固高科技领先地位，遏制竞争对手科技发展。维护并扩大在 AI、半导体、生物技术等前沿领域的全球领导力，将是核心要务。针对特定竞争对手（尤以中国为甚），策略将更聚焦于阻滞其在关键技术领域的追赶。手段或将涵盖维持高关税壁垒、强化并扩大出口管制（如针对先进芯片、制造设备及相关技术）、推动盟友协同管制（构建“小院高墙”），以及限制对相关国家高科技领域的投资。

（2）保障战略产业安全与供应链韧性。确保国防、能源、医药、关键矿产、先进制造业（如造船）等战略性产业的国内生产能力与供应链安全，将被置于优先地位。关税将成为保护国内产业、激励生产回流或向盟友“友岸外包”的重要政策工具。

（3）制造业复兴策略的聚焦。推动制造业复兴的总目标虽不变，但鉴于全面复兴的现实制约（成本、劳动力、技术等），政策资源与关税保护可能从“全面铺开”转向“重点突破”。高价值、高技术、资本密集型的特定制造业领域，尤其是

与国家安全、科技领先相关的产业，或将成为优先扶持的对象。

(4) 对华策略的精准化。考虑到全面贸易战的高昂经济代价（通胀压力、增长损失、供应链扰动）以及对手的经济体量与反制能力，对华贸易策略或将从“全面施压”转向更具针对性的“重点遏制”。即在维持对多数商品较高关税水平的同时，将最严厉的措施（如极高关税、出口管制、投资限制）集中于对手力图突破的高科技领域及被视为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产业。

(5) 构建“关税同盟”的挑战。尽管特朗普政府可能尝试联合盟友，共同对战略竞争对手施加贸易压力，构建所谓的“关税同盟”或“关税墙”，但其单边主义做法及对盟友亦施加关税的历史，已对其信誉及盟友的合作意愿造成损害。各国自身经济利益、对特定市场的依赖以及对美国政策持续性的疑虑，都将制约其参与协调一致关税行动的积极性。虽在特定领域（如技术管制）或可达成部分协调，但构建广泛、稳固的对特定国家的“关税同盟”将面临显著挑战。

总体来看，贸易战 2.0 的推进不仅是关税政策的升级，更反映了全球经济秩序正在经历的深刻调整。其核心特征表现为，国际经贸关系的重心正从基于规则的多边协调，转向更侧重大国力量博弈与地缘经济目标的实现，这实质性地削弱了现有全球贸易治理框架的功能与权威。当国家安全、技术主导权及供应链韧性等战略性因素在国家政策议程中的优先序位提升，甚至超越传统的经济效率考量时，其潜在后果是加剧全球经济的分割风险，阻碍有效的国际合作，并可能对未来世界经济格局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造成长远的不利影响。

三、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系统回顾了贸易战 1.0（2018—2024 年）对全球经济格局的深远影响，并基于对特朗普政府 2.0 时期政策动向的分析，展望了全球经济博弈进入新阶段的特征与挑战。主要研究发现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 美国经济代价与政策效果复杂并存。贸易战 1.0 期间，尽管多项研究指出美国承担了主要的直接福利损失，且其制造业回流目标未达预期，但其政策组合拳仍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美供应链的部分“脱钩”，并对中国高科技产业施加了显著遏制压力。此外，在《芯片和科学法案》等产业政策驱动下，美国半导体等领域的制造业投资确实大幅增长。但这些新建产能的实际产出贡献、就业拉动效果及其在全球市场中的长期竞争力，仍需等待建设周期完成和市场检验。

(2) 全球供应链格局深刻重塑。贸易战加速了全球供应链的调整，呈现出更为复杂、迂回的特征，逐步形成了以中美为双中心、多节点网络化的新格局。在此过程中，中国与东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的经贸联系得以加强。

(3) “高通胀+强美元”环境制约中国名义 GDP 追赶。尽管中国实体经济展现出较强韧性，但过去数年全球高通胀与美元强势周期叠加人民币汇率波动，导致以美元计价的中美名义 GDP 差距阶段性扩大，凸显了金融因素和宏观环境在国际比较中的重要影响。

(4) 贸易战 2.0 展望——对抗与约束并存。展望未来，特朗普政府可能在贸易战 2.0 阶段采取更激进、更具针对性的遏制策略，尤其是在高科技和战略性产业领域。然而，其政策的推行亦将受到国内通胀压力、高额债务以及国际社会反制等多重因素的显著约束。

基于上述观察与分析，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启示：

(1) 强化宏观调控与金融稳定，对冲外部风险。面对潜在的外部冲击和金融市场波动，应灵活运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工具箱，稳定经济增长预期与市场信心。加强汇率预期管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缓解对进出口企业和名义 GDP 的冲击。同时，深化与主要贸易伙伴的本币互换和区域性结算安排，逐步降低对单一货币（美元）的过度依赖，增强金融体系的韧性。

(2) 优化产业升级战略，聚焦关键领域实现突破。持续将科技自立自强置于核心位置，加大对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的长期稳定投入。集中资源攻关半导体设备、核心材料、EDA 软件等关键“卡脖子”环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鼓励中国企业深度参与乃至主导国际技术标准的制定，利用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孵化新技术、新业态，并推动本土创新方案走向全球。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优化产学研协同机制，营造鼓励长期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生态。

(3) 推动供应链多元化布局，深化新兴市场合作。积极引导和支持企业根据市场化原则进行全球供应链的多元化和韧性化布局。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多边及区域合作框架，深度开拓东盟、南亚、中东、中东欧、拉美等增长潜力大的新兴市场。加强与这些伙伴在产业链上的分工协作与价值链整合，促进本土企业向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攀升。提升跨境物流、供应链金融、法律合规等专业服务能力，增强中国企业在全球网络中的综合竞争力。

(4) 稳妥应对新一轮保护主义，拓展多元国际协调。面对贸易战 2.0 可能带来的更严峻挑战，一方面，要善用 WTO 争端解决机制等多边平台，对违反国际规则的单边关税和技术限制措施进行交涉，争取国际社会理解与支持；另一方面，加强与欧盟、日本、韩国及其他重要经济体的沟通协调，探索在维护多边贸易体系、应对气候变化、制定数字经济规则等领域形成共识或开展互补合作，以对冲单边主义的负面影响。同时，持续优化国内营商环境，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发展环境，吸引和稳定高质量外资，鼓励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和区域总部。特别地，在 2025 年 4 月召开的中央周边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会议也强调，要与周边国家巩固战略互信，妥善管控矛盾分歧，深化发展融合，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合作。这一顶层设计为中国应对贸易战 2.0 及遏制性保护主义提供了宝贵的战略纵深和坚实的区域合作基础。这启示我们，必须将巩固周边战略互信与维护多边规则紧密结合、协同推进，通过深化区域合作的成功实践，来彰显中国方案的价值并提升其全球影响力。

(5) 关注内部结构性挑战，统筹短期纾困与长期转型。在应对外部压力的同时，需着力解决国内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问题。加大对受贸易摩擦冲击较大的行

业、地区和中小微企业的纾困帮扶力度，做好失业人员的转岗培训和社会保障。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激发民营经济活力，为各类市场主体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将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实现绿色低碳转型、数字化发展紧密结合，培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锻造面向未来的国家核心竞争力。

总而言之，贸易战进入 2.0 阶段，预示着全球经济博弈的对抗性可能增强，对国际经贸合作构成严峻挑战。中国需在保持战略定力、有效应对短期冲击与坚持长期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之间寻求最佳平衡。既要积极防守，稳住经济基本盘，也要主动作为，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科技自主创新步伐。同时，应灵活运用多种外交手腕，努力维护和拓展国际合作空间。中美经贸关系的演变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唯有坚持底线思维，采取多元化策略，并不断提升自身综合实力，方能有效化解风险，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在风云变幻的国际格局中稳健前行。

[参考文献]

- [1] AMITI M, REDDING S J, WEINSTEIN D E. The Impact of the 2018 Tariffs on Prices and Welfare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9, 33 (4): 187–210.
- [2] FAJGELBAUM P D, GOLDBERG P K, KENNEDY P J, et al. The Return to Protectionism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20, 135 (1): 1–55.
- [3] CAVALLO A, GOPINATH G, NEIMAN B, et al. Tariff Pass-through at the Border and at the Store: Evidence from US Trade Policy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Insights*, 2021, 3 (1): 19–34.
- [4] ALFARO L, CHOR D. Global Supply Chains: The Looming “Great Reallocation” [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23, No. w31661.
- [5] FREUND C L, MATTOO A, MULABDIC A, et al. The Supply Chain Shock from the US–China Trade War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24, 146: 103812.
- [6] 丁浩员, 董文娟, 余心珂. 贸易政策冲击下的跨国供应链断裂与重构研究 [J]. *经济研究*, 2024, 59 (8): 95–113.
- [7] FLAAEN A, PIERCE J R. Disentangling the Effects of the 2018–2019 Tariffs on a Globally Connected US Manufacturing Sector [R]. *Finance and Economics Discussion Series*, 2019, No. 086.
- [8] AUTOR D H, BECK A, DORN D, et al. Help for the Heartland? The Employment and Electoral Effects of the Trump Tariffs in the United States [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24, No. w32082.
- [9] BOWN C P. How the United States Marched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nto Its Trade War with China [J]. *East Asian Economic Review*, 2020, 24 (4): 349–388.
- [10] HAN P, JIANG W, MEI D. Mapping US–China Technology Decoupling: Policies, Innov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J]. *Management Science*, 2024, 70 (12): 8386–8413.
- [11] AUTOR D H, DORN D, HANSON G H, et al. Importing Political Polarization? The Electoral Consequences of Rising Trade Exposure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20, 110 (10): 3139–3183.
- [12] FLAAEN A, HORTAÇSU A, TINTELNOT F. The Production Relocation and Price Effects of US Trade Policy: The Case of Washing Machine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20, 110 (7): 2103–2127.
- [13] JIAO Y, LIU Z, TIAN Z, et al. The Impacts of the US Trade War on Chinese Exporters [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24, 106 (6): 1576–1587.

- [14] 樊海潮, 张军, 张丽娜. 开放还是封闭——基于“中美贸易摩擦”的量化分析 [J]. 经济学 (季刊), 2020, 19 (4): 1145–1166.
- [15] CHOR D, LI B. Illuminating the Effects of the US–China Tariff War on China’s Economy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24, 150: 103926.
- [16] JU J, LI L, NIE G, et al. Nonlinear Capital Flow Tax: Capital Flow Management and Financial Crisis Prevention in China [J]. China & World Economy, 2019, 27 (4): 1–28.
- [17] AUTOR D H, DORN D, HANSON G H. 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3, 103 (6): 2121–2168.
- [18] HANSON G H. The Impacts of the US–China Trade War [J]. Business Economics, 2020, 55 (2): 69–72.
- [19] HANDLEY K, KAMAL F, MONARCH R. Rising Import Tariffs, Falling Export Growth: When Modern Supply Chains Meet Old – style Protectionism [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20, No. w26611.
- [20] CALIENDO L, PARRO F. The Quantitative Effects of Trade Policy on Industrial and Labor Location [R]. Yale University and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2020.
- [21] STRAIN M R. Protectionism is Failing and Wrongheaded: An Evaluation of the Post–2017 Shift toward Trade Wars and Industrial Policy [C]. Kearney M S, Pardue L (Eds.). Building a More Resilient US Economy. Aspen Institute, 2024.
- [22] LAWRENCE R Z. Is the United States Undergoing a Manufacturing Renaissance That Will Boost the Middle Class? [R].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olicy Brief, 2024, No. 24–12.
- [23] CRANE K, HEATH T R, STARK A, et al. The Effectiveness of U. S. Economic Policies Regarding China Pursued from 2017 to 2024 [R].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24.
- [24] DE LONG J B, SUMMERS L H, ABEL A B. Equipment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How Strong is the Nexus? [J].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992 (2): 157–211.
- [25] PODRECCA E, CARMECI G. Fixed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New Results on Causality [J]. Applied Economics, 2001, 33 (2): 177–182.
- [26] LOVELY M E. Manufacturing Resilience: The US Drive to Reorder Global Supply Chains [C]. Building a More Resilient US Economy. Aspen Institute, 2023.
- [27] GROSSMAN G M, HELPMAN E, REDDING S J. When Tariffs Disrupt Global Supply Chain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24, 114 (4): 988–1029.
- [28] BOWN C P. Four Years into the Trade War, Are the US and China Decoupling? [R]. Washington, DC: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22.
- [29] BALDWIN R, FREEMAN R, THEODORAKOPOULOS A. Hidden Exposure: Measuring US Supply Chain Reliance [J].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023 (2): 79–167.
- [30] 沈国兵, 王译平. 美国供应链重塑与中国外贸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56 (4): 1–15.
- [31] FAJGELBAUM P, GOLDBERG P, KENNEDY P, et al. The US–China Trade War and Global Reallocation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Insights, 2024, 6 (2): 295–312.
- [32] WAUGH M E. The Consumption Response to Trade Shocks: Evidence from the US–China Trade War [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19, No. 26353.
- [33] 谭莹, 李昕, 杨紫, 等. 加征关税如何影响中国劳动力市场 [J]. 世界经济, 2022, 45 (9): 32–56.
- [34] 余森杰, 田巍, 郑纯如. 中美贸易摩擦的中方反制关税作用研究 [J]. 经济学 (季刊), 2022, 22 (6): 2041–2062.

- [35] 田巍, 徐铭桂, 余森杰. 贸易关税和中国零售品价格 [J]. 中国工业经济, 2023 (12): 42-60.
- [36] 樊海潮, 丁关祖, 张丽娜. 外部经贸冲击、国内要素流动与中国经济增长 [J]. 经济研究, 2024, 59 (7): 151-169.
- [37] XUE S. Trade Wars with FDI Diversion [R]. Princeton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2024.
- [38] JU J, MA H, WANG Z, et al. Trade Wars and Industrial Policy Competitions: Understanding the US-China Economic Conflicts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24, 141: 42-58.
- [39] CAO Y, DE NICOLA F, MATTOO A, et al. Technological Decoupling? The Impact on Innovation of US Restrictions on Chinese Firms [R].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24.

From Trade War 1.0 to 2.0: A New Phase in Global Economic Competition

JU Jiandong HOU Jianghuai

Abstract: Based on a review of the latest literature and relevant data,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ssesses the profound impact of Trade War 1.0 (from 2018 to 2024) on the global economic landscape and delves into the policy characteristics, underlying logic, and potential shocks of the Trade War 2.0 phase (Trump 2.0 era). The study finds that during Trade War 1.0, the US bore the primary welfare losses, and manufacturing reshoring effects were limited, while partly contributing to US-China supply chain decoupling and the technological containment of China. Concurrently, a new global trade pattern emerged, centered on the US and China with a multi-node network structure. China's real economy demonstrated resilience and progress in emerging technologies, though its nominal GDP catch-up pace slowed due to inflation and exchange rates, while the lagging effects of large-scale US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s deserve attention. Looking ahead to Trade War 2.0,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potentially more aggressive tariff strategies, its underlying policy logic, and the constraints it faces from inflation and debt. It anticipates a possible slide towards a non-cooperative equilibrium in the global trade system, with a potential shift in US strategic focus towards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 renewed emphasis on manufacturing reshoring, and targeted containment of China. Through a historical review and future outlook, this paper provides a systematic analytical perspective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and navigating the challenges of this new phase in global economic competition.

Keywords: Trade War; Tariffs; US-China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责任编辑 张晨烨)